

大家小说

人生 撷英

# 美丽人生 山河无恙 和平万岁

## ——缅怀杜近芳先生

王勇



杜近芳

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者之一、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在电视广播中、新闻报刊上、微信朋友圈和各类媒体平台上，社会各界和广大戏迷观众以各种方式寄托着对杜近芳老师的怀念。人们使用频率最高、最多的词汇就是“太美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看望慰问杜近芳老师亲属代表时说道：“杜近芳同志的一生是美丽的，光彩照人！”怎一个“美”字了得！我想，在今天杜近芳老师追思会上，就让我们一起追慕思念她的“美丽人生”。

丰富了旦角表演艺术的内涵和表达方式，拓展了京剧的表现领域，为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和推陈出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杜近芳老师的一生，是执着艺术之美的人生。

作为一名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和京剧从业者，杜近芳老师始终牢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生饱含着对京剧艺术最为赤诚的执着。《白蛇传》《柳荫记》《玉簪记》宣扬冲破封建礼教桎梏，呼唤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白毛女》以古典样式的现代转化来表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红色娘子军》突出表现了革命的熔炉使奴隶变成战士的主题。她常说，我们不能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老演老戏，老戏老演，我们要呼应时代的要求，要奋力创作，用精品剧目回报人民。杜近芳老师曾戏称自己是“戏疯子”，在复排《谢瑶环》时，她把剧本贴了几面墙，10多天不出房门，从早到晚地琢磨。为演好京剧现代戏，她下矿井，下连队，到了海南就去看牛棚，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找人物感觉并进行艺术提炼。每一出戏的创作演出，她往往要做大量的案头功课，了解所演角色的背景、年龄、身份、性格，一定做到吃透为止。每一个动作设计，她都要想明白其中的行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创造。经她演绎的人物形象，总有着一种别样的韵味与风采，吸引了几代观众为之痴迷和激赏。

“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让我以文艺服务人民，我从一个旧社会的艺人成为人民的艺术家，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杜近芳老师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充满着对党的感恩之情。是的，作为一名知恩图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终其一生用艺术回报党和人民。1952年，她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跨过鸭绿江，以满腔的热忱和精湛的艺术慰问战斗一线部队两个月，受到志愿军官兵的高度赞扬。她曾两次随团赴欧洲演出，第一次是带着《白蛇传》中“断桥”一折访演法国、英国、比利时等9国，历时8个月，引起轰动。第二次是将《白蛇传》全剧带到欧洲6国访演半年，再次轰动巴黎，法国《世界报》盛赞为“诗情洋溢的美妙诗剧”，并为当年的中法建交营造了良好氛围。她携《霸王别姬》一剧出访巴西、阿根廷等拉美4国，是京剧历史上第一次走进拉丁美洲，当地媒体将其饰演的“虞姬”誉为“东方皇后”。她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荣获两枚金质奖章和一枚银质奖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她多次作为中国艺术团的主要成员，出访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为推动国粹走向世界和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她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金唱片奖”，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嘉奖”，原文化部授予的“第三届造型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中国剧协授予的“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

晚年的杜近芳老师，致力于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不同年龄段的弟子们。她就像蜡烛，即便燃烧自己，唯愿薪火相传。她住院期间，只要精神尚可，就会在病榻上用电话或视频给弟子们谈戏说腔。我刚到国家京剧院工作，当听同事们讲述她的时候，仿佛就看见生生不息的京剧之魂。她就像晚霞，哪怕霞光将逝，也要把最后一抹绚烂的美丽洒向人间。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先贤远去，美丽长留。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杜近芳老师，从一点一滴、一丝一缕的回忆中去怀想和感悟她的美丽人生，从薪火相传的年轻一代的精彩舞台呈现中，去欣赏和领略她光彩照人的美丽艺术形象，希望把她的艺术和艺术精神流传下来，不断地发扬光大。

明年，也就是杜近芳诞辰90周年、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国家京剧院计划举办“芳华绝代——杜近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演出”活动，复排杜近芳老师的代表剧，由本院优秀演员和来自全国的、杜近芳老师的亲传弟子们演出，以此纪念、告慰杜近芳老师的在天之灵；传承、弘扬杜近芳老师不朽的艺术和光辉的人格。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院长）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杜近芳老师的一生，是追求艺术之美的人生。

当我们提到某一位艺术家时，往往联想到她的代表性作品。提起杜近芳老师，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美轮美奂的《白蛇传》和温柔善良的白素贞，浩然正气的《谢瑶环》和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清新淡雅的《柳荫记》和为爱至死不渝的祝英台，家国兴亡的《桃花扇》和忠贞刚烈的李香君，缠绵悱恻的《玉簪记》和追求个性自由的陈妙常，文武大戏《野猪林》和坚贞凄美的林娘子。1955年，当由田汉编剧，杜近芳与叶盛兰联袂主演的京剧《白蛇传》一经上演，便风靡全国，久演不衰，被全国多个剧种、数百家剧团移植排演，成为家喻户晓的优秀保留剧目。1958年，由中国京剧院创排，杜近芳领衔，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加盟出演的京剧《白毛女》，不仅对京剧现代戏，也对戏曲现代戏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杜近芳老师还创演了《蝴蝶杯》《余赛花》《桃花村》《吕布与貂蝉》《周仁献嫂》《西厢记》《木兰从军》《梁红玉》《美人鱼》《牛郎织女》《满江红》《红色娘子军》《柯山红日》《林海雪原》《山村花正红》等几十出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和整理改编传统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如璀璨星辰闪烁在艺术星汉之上。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杜近芳老师的一生，是创造艺术之美的人生。

从早年出道起，杜近芳老师就有“小梅兰芳”之称。其一是扮相美。她的古装和大头扮相俊美，清新典雅，兼具古典意蕴和时代气息，特别是把区别男性旦角的女性美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唱腔美是其二。杜近芳老师的嗓音先天禀赋极佳，宽、甜、脆、亮、圆，如出水芙蓉，清透水灵，无雕琢之痕，在唱腔中饱含着多层次的非厚情感，达到了声情并茂、融情入境的艺术境界。《白蛇传》中“青妹慢攀龙泉宝剑”，《谢瑶环》中“谢瑶环深宫九年整”，《柳荫记》中“自从别兄回家乡”，《白毛女》中“大雪飞北风紧天阴云暗”，《红色娘子军》中“一番话字字重千斤”等，都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段。杜近芳老师深得玉珊瑶和梅兰芳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的真传衣钵，无论是“唱念做打”四功，还是“手眼身法步”五法，既具有梅派的雍容、大气、端庄，又蕴含王派的筋骨、爽朗、舒展，同时充分发挥自身天然女性美的特质，形成了鲜明的、独树一帜的旦角表演艺术风格，



国家京剧院举办杜近芳先生追思会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精神，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会和四野后代联谊会，于2020年10月在丹东共同发起、联合举办了“共和国不会忘记——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主题活动。这次活动邀请了120位志愿军的后代参加，我有幸在受邀之列。

当时我们参观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和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和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篮和鲜花，在鸭绿江和断桥上抛撒花瓣祭拜先辈……

仔细回味3天的活动，抗美援朝纪念馆里一组名为“冰雪长津湖”的群雕最让我震撼。这组雕像里的战士，无论是站姿、蹲姿还是卧姿都手持武器，保持着时刻准备战斗的状态。雕塑家用手中的刻刀，讲述着70年前3个“冰雕连”的英雄故事。

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9兵团奉命到长津湖地区参加分割、包围、歼灭美陆战1师和美步兵7师的战斗。11月底的长津湖冰天雪地、酷寒难挡，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负责打击的部队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竟然有3个连的干部和战士全部冻成“冰雕”，长眠于自己的战斗位置。这场战斗，志愿军以5:1的巨大牺牲，牵制了位于东线的美军，保障了西线参战部队侧翼的安全，为入朝作战的第二次战役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面对这些“冰雕连”，我心疼得要流血。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躯体。谁不知道天寒地冻难忍？谁不知道饥肠辘辘难受？为了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他们甘愿踏冰卧雪、忍饥挨饿，在自己阻击的位置上一动不动，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逃窜的美军虽然毫无阻挡地经过志愿军阵地，但他们还是驻足向中国军人行了庄严的军礼，美国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感叹中国军人是“值得尊敬的对手”，“长津湖战役是钢铁的部队在与钢铁的人作战”。负责打击的志愿军20军59师戴克林师长看到一尊尊虽然化为“冰雕”，但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战士，悲痛不已，泪如雨下。9兵团司令员朱时轮回国时，面对长津湖的方向脱帽鞠躬，声泪俱下：多好的战士啊！多么勇敢而忠诚的战士啊！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鸭绿江上连接中国与朝鲜的大桥共7座，其中3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美军炸毁，

成为见证历史的“断桥”。它们分别是“鸭绿江断桥”“河口断桥”和“鸭绿江燕窝铁路桥”。

这三座断桥中，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河口断桥”。1950年10月19日，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将军仅带1名参谋、2名警卫员和1部电台，从这座桥秘密地走上了抗美援朝战场。基于这个因素，在河口断桥我方的桥头建了一个彭德怀广场，广场的中间方了一尊将军横刀立马的雕像，靠近桥头的地方还有一尊毛岸英站立的雕像。

河口断桥两侧插满了红旗，这些红旗不是普通的红旗，而是入朝参战部队的战旗，桥上每面红旗都印着参战部队的番号。

“父亲部队的战旗在哪儿？”上了桥，我急切地寻找。看到同行的伙伴在自己父亲战旗前拍照留影，我真担心景区的工作人员遗漏了什么。走到桥中间，终于看到一面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6师”的战旗，这就是父亲部队的战旗！

看到这面战旗，我心如潮涌。江风呼啸，战旗猎猎，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父辈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开赴战场的身影，仿佛闻到敌机狂轰滥炸的硝烟味，仿佛听到了战场上的厮杀声……父亲啊，过去我只为您而骄傲，今天我却为您而担心。虽然历史的这一页早已翻过，可我仍然担心，您渡江时穿的衣服够不够暖？行军时有没有遇见敌机的轰炸？埋伏时手脚有没有冻伤？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中国有197653位战士战死他乡未能返回。“197653”，这是一个滴血的数字，一个令敌人胆战心惊的数字，也是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心痛而不能忘却的数字。

河口断桥1942年建成，1951年3月29日被美军炸毁，与鸭绿江断桥一样，战争结束后，中方修复了自己的一侧，并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次活动中，我们遇见了两位志愿军老战士。他们参战时还是英姿勃发的小战士，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24日下午，我们乘车来到“上河口鸭绿江铁路大桥”，大桥的一头是我辽宁省宽甸的上河口地区，另一头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清水市。不言而喻，这座铁路桥对于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有多么重要。

上河口鸭绿江铁路大桥位于我方的桥头矗立了一座国门，国门的旁边是中朝边界19号界碑，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又称这座桥为“上河口国门大桥”。国门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凭票登高望远。国门的二层是一个瞭望厅，透

过宽大的玻璃窗，一眼可以看到大桥的尽头。

在瞭望厅里，我们与老英雄徐恒江不期而遇。徐老英雄告诉我们，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志愿军102师高炮506团某班的班长。他的阵地就在这个桥头，任务是和全团战友一起守护这座铁路桥。当年他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人们都称他为“娃娃班长”。丹东的鸭绿江大桥和河口的公路桥被炸毁后，这座铁路桥自然承担起战争运输的重任，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血运输大动脉”。1952年4月23日，他所在的506团抓住战机，在1分15秒的时间里击落了3架美军F-84飞机，重伤1架，创造了东北境内高炮部队一次击落敌机的最好成绩，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讲到这里，徐老英雄非常自豪地向我们展示胸前佩戴的4枚纪念章。其中一枚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是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枚。2019年10月1日，他戴着这枚纪念章，乘礼宾车经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25日下午我们在丹东的鸭绿江大桥见到了另一位志愿军老兵——英焕章，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42军军长吴瑞林的警卫员。英老英雄得知我们25日下午在鸭绿江断桥开展活动，便在女儿、女婿的搀扶下来到活动现场。因为他知道，老首长的儿子和女儿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英焕章老英雄一出现我们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老英雄已年过九旬，步履蹒跚。他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讲述，当年他们如何用担架把吴瑞林军长抬到三八线的某个高地，吴瑞林军长如何观察地形……讲着、讲着老英雄的双眼噙满了泪水；讲着、讲着，老英雄的目光移向了远方。我明白，此时此刻老英雄看到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是不畏牺牲的战友；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穿云裂石的厮杀声。老英雄口中不断地念叨：“吴军长发着高烧，我们把他抬到三八线上……”老英雄的表述虽然不太明确，但这已不重要了，我们更在意的是老英雄的真情。70年过去了，老英雄最想念的仍是他的首长和战友，最不能忘怀的仍是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离开丹东，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脚下的高山、丘陵、江河、湖泊、城市、村庄……看着这无垠的山河，静好的大地，我更感到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更珍惜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也更理解了70年前抗美援朝决策的深远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

## 学海星光

对于罗艺军先生，我只能遥望，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无缘相识。但是，却曾有一事交集。若干年前，北京一位资深学者转来一篇罗艺军先生的专论，是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史实辨析，他以见证者的身份试图还原历史现场及其真相，并谈及史学地位的评价。该文在北京不便发表，希望在上海刊物面世。读完以后，我的心里也是一震，这是颇为得罪人的事情，一些基本的史实认知会有变化，涉及相关人事关系。在此之前，罗艺军先生发表过一篇《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论及了郭安仁、王越两位同志的一些情况，该文应该是它的续篇，继续披露历史真相。我遵嘱转交给上影集团主要负责人，期待能在他们旗下的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但是，后来也是没有回音，不了了之。

我心里颇为内疚，朋友相托之事没有完成，可以想象罗艺军先生应该更是心寒。让我更觉内疚的是，《人文》2019年12月31日发表了罗艺军先生的《夏衍未实现的电影遗愿：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二卷》一文，还是有关阐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相关史实。此文是罗艺军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此时他已93岁高龄，半年以后溘然离世。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在一本与电影关系不大的刊物发表电影史实核心内涵的论文，心心念念如此，不知他是怎样一种心情？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二卷，是否也是他的“未实现的电影遗愿”？

此时，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依稀清晰起来，一位倔强的老人。我很敬佩，作为一位史家，罗艺军先生是卓越的，至少在人格上是卓越的，不说一句谎话，不写一个谎字，冒着被人误解甚至攻击，他坚持自己的史学原则。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不易，需要胆略和勇气，也呈现了他的人品和文品。

在此，我也联想到戏剧理论界的田本相和董健两位老先生。他们前几年也已作古，比罗艺军先生年少几岁。他们晚年，也被称为“大炮”，以敢讲真话、实话闻名。岂知真相是美丽而残酷之物，披露需要慎之又慎的，考验一个人全部的文化 and 道德修养。三位先生，是到了“老言无忌”，还是在中国士文化熏陶下的人格光芒，我相信是后者，至少

是统率了前者的后者。中国是一个“以史立身”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像罗艺军先生这样的史家，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余秋雨曾如此评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派嘈杂声中戛然而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与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毫无疑问，罗艺军先生也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让人们在蓦然回首之际，见到“悬在他们身的那支巨大史笔”。中国的史学，就是由罗艺军先生这样的一个个史家组成的，写历史就是写自己。

至于罗艺军先生的学术成就，饶曙光先生的《罗艺军与中国电影学派》已有详尽阐述。在我的认知中，罗艺军先生的学术形象，似乎是既矛盾又统一，矛盾者指他既是电影民族化的倡导者，又被称为“洋务派”，统一者他又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在他的美学观念中，民族化既是一个闭环结构，更是一定开放结构，它在吸纳外来艺术的过程中，以强大的底色、定力和化合能力，将之同化和融化，成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强身健体”的主要营养。在中国电影风格养成中，民族化是“主食”，“洋务派”是“维生素”。曾有专家问我，若各用一个字概括中国和美国的差异，该是哪两个字？我思考片刻，无言以对。他说，中国是“融”，美国是“容”，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化”能力，而美国具有充分的“包容”能力，两者表面意义似乎接近，内在含义却是截然不同，“包容”不等同于“融化”。细思之，颇有道理。罗艺军先生既矛盾又统一的学术姿态，似乎与之契合，包含着“融化”的意义。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内含悖论和辩证，如此才能让人深入思考，故而我特别赞同罗艺军先生的观点：“谈电影的民族化，绝不是不要引进外国的，如果不是引进外来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化的命题”，“那种断言中国只有电影批评而根本没有电影理论的论断，其症结在于无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而按照西方理论框架来衡量中国电影理论。”这是一种战略思想家的思维。我想指出的是，罗艺军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有思想出发点的，也是充满辩证法和

# 写评论就是写自己

——忆著名电影史家罗艺军  
厉震林

美学力量感的。

罗艺军先生曾有如此期待：“如果说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基本处于引进、选择、吸收西方电影理论的阶段，那么，在新世纪我期望电影理论应承担一个艰巨任务，逐步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是我们电影学人需要践行的，罗艺军先生的人品和文品，一定会神助我们。

一件小事，在此表述，表达我的内疚之情，也寄托我的思念。写评论就是写自己，我希望能够罗艺军先生一样，写好自己。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